

● 束锡红 (北方民族大学 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银川 750021)

黑城残篇频回首——

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

[关键词] 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书; 搜集整理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英国黑水城文献实物的现场考察, 提供了流失英国、法国的古代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及从未发现的装帧形式, 以及元代松江僧正管主八为沙州捐施佛经的新材料。对于活字印本的历史、书籍装帧史和元代初期沿海佛教和敦煌佛教的交流, 进行了个案的分析, 以新的视角对未经开掘的西夏文献搜集整理进行了追寻和探讨, 为今后西夏文献的研究做了一定的基础工作, 有利于促进国内对西夏文献的研究工作。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1005-8214(2012)08-0083-08

历史之书翻回公元 1038 年这一页时, 在中国西北部有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势力宣布称王, 自言“大夏”, 也就是后来的西夏王朝。^①此后先与同时代的北宋、辽, 后与南宋、金鼎足而立, 顽强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化, 并使这个地控“东尽黄河, 西界玉门, 南接萧关, 北控大漠”的小王朝成为了当时西北

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都会。然而, 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 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 190 年的王朝仿佛一夜间烟消云散。

一 黑城旧踪探寻

闻名遐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 那里收藏着斯坦因于上世纪初从黑水城遗址等地盗运的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黑水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兰库布镇东南 25 公里的荒漠之中。绝对高度为 2854 英尺 (870 米), 地理坐标: 纬度 41° 45' 40", 经度 101° 5' 14.85"。西夏王朝曾在此设置“黑水监军司”, 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西夏宝义元年 (1226 年) 蒙古军攻破黑水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1286 年) 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亦集乃”为西夏语音, “亦集”, 即“水”意, “乃”, 即“黑”意, 译成汉语为“黑水”。元代沿用西夏旧称, 今称额济纳旗的“额济纳”三字, 实为“亦集乃”之异写, 其源仍为西夏语音。据蒙古传说, 黑水城最后一位守将号称黑将军。他英武盖世, 叱咤无敌, 在与汉族争霸中原时, 出师不利, 退守孤城。中原大军久攻不克, 见城外额济纳河流贯其间, 便以沙袋塞其上流, 断绝城中水源。守城者于城内掘井, 至极深而滴水未见。黑将军被迫全力出战, 未战前, 以所存白金八十车连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英藏黑水城西夏文历史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及专题研究”(项目编号: 09BTQ018) 研究成果

① 《宋史》卷 485 《夏国传》上, 元昊上宋仁宗表章: “臣祖宗本出帝胄, 当东晋之末运, 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 115 《西夏外记》: “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 134 《西夏传》: “夏之立国旧矣, 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 称元魏衰微, 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 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 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 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 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 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 立文武班, 规定官民服侍, 定兵制, 立军名, 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 (西夏文)。公元 1038 年 10 月 11 日, 李元昊称帝, 建国号大夏。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 甘肃, 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 其疆域方圆数千里, 东尽黄河, 西至玉门, 南界萧关 (今宁夏同心南), 北控大漠, 幅员辽阔。

同其他珍宝倾入井中，又亲手杀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敌手，然后率士卒出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身亡。中原军队攻陷黑水城后，大肆搜寻而未能得见宝藏。而黑水城因断流缺水，至此逐渐荒芜。经由近700年的岁月更迭，往日的烟火已然消散，只剩下高达九米的城墙孤独地承受塞北风沙年复一年的侵蚀，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也成云烟，只有那嶙峋的怪树林伴和风的呼啸。黑将军埋藏宝藏的传说无从得知其真假，但西夏人民确实为后人埋下了留有他们生命印痕宝藏。他们将对命运的理解、思考和赞美谱写在一页页长卷上，把他们的心情和憧憬寄托于一尊尊佛像中，将创造和积淀的西夏文明留存在织品、绢画、木刻等成千上百件工艺品中。他们的形体化成了历史的尘埃，但他们的灵魂却在期待经由后代人智慧之光的点染复活。

凡流传有关宝藏传说的地方大多是探险家们热衷的去处。寂静的黑水城迎来的首批“光顾者”是俄国的探险队。1907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蒙古四川探险队。1908年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进行考察，当打开一座废弃了的佛塔后，他惊呼“我发现了巨大的博物馆。”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进行了9天的挖掘，用骆驼驮走了40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如果置身收集这些文献和文物的俄国博物馆，我们会发现简单的数字根本无法说明科兹洛夫运走的是怎样无价的宝藏。我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什博物馆考察时，馆员拉开一个巨大的抽屉，露出许多陶瓷残片。他介绍说：“这些碎片有1700多件，它们是彼得·科兹洛夫通过科学考察从哈拉浩特（黑水城）带回来的。碎片是14世纪中叶元朝时期的。这些碎片当中比较珍贵的是上面带有钴的花纹，如果我们把它们重新复原的话就可以想象得出它们当时精美的样子。”在观看的时候，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这些精美的艺术品公布于国人。

黑水城的劫掠之灾并未就此结束。相较于科兹洛夫，英国东方学和考古学专家斯坦因更具备考古的专业素质和眼光。而他的学术修养和热情、丰富的考古经验，以及天生的耐心和毅力使他对黑水城遗存文献和文物的盗运更为彻底。1914年，斯坦因率领他的队伍自肃州至此，就黑水城内外，重新挖掘、筛选。1917—1922年，斯坦因获取黑水城文献以后，按照他中亚探险获得资助的比例，分别交送给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许多艺术品包括绢画、版画、木雕等，如斯坦因《亚洲腹地》书中刊布的材料，据英

国国家图书馆吴芳思 Francis Wood 女士和原大英博物馆韦陀 White Field 先生说明，都不见于英国两馆的收藏，应已划归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所有，至今很少有关于这部分材料的情况报道。70年代大英博物馆和大英图书馆分立，文献材料全部移交给现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二 英藏黑水城文献的统观与重构

第二日，清脆的鸟叫和清澈的阳光从窗帘后渗入，心情又随之舒朗起来。这是我们在英国图书馆进行分类著录工作的第一天。西夏文献的宏博内容和万千气象一页页地在眼前展开。虽然以前也曾翻阅、查看并研究过国内保存的古代写本或长卷，但英藏西夏文献仍然能不断地让我们惊异、感叹。当然，我们要分清主次，如果将那些点滴的激动人心的奇观式的发现比做文饰，那么我们有必要先通观一下这幅杰作的体式和结构。

英藏西夏文编号 OR.12380，总共为4000余号，有的编号下有多个甚至30多个残片，即总共有7300多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各地汉文材料编入 OR.8212 系列。汉文材料首先由马斯伯乐公布了607件，而佛经以外的社会文书材料即将由沙知先生编辑、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马斯伯乐已发表材料以外的汉文残片，则已经由郭锋先生发表。而黑水城的西夏文献还封存于密室中，等待研究和整理面世。

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献除大量的西夏文外，还有为数可观的藏文、回鹘体蒙文等。黑水城保存的这些文献几乎是一个惊世奇迹，谁也无法估量它们的价值。记得伯希和在敦煌发现回鹘写本时这样感慨道：“您知道回鹘文写本该是多么珍稀啊，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品可以用一只手的指头来计算，而且它们均出自于穆斯林，我相信没有一件是真正用回鹘方言写成的。”^{〔1〕}黑水城遗书的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官府文书、军法兵书、典当契约、韵类辞书、日用杂记、诗歌艺文、医学药方、星历占卜、佛教经典等，为研究西夏学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语言、文学、科技、考古等学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写卷书体主要有楷书、行书、草书，装帧形式主要有卷子本，蝴蝶装，粘叶装，甚至还有至今从未发现过的正面背面文字互倒但又不同于梵夹装的特殊形式。英藏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中，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有西夏供养人题记、供养人发愿文、词咏偈语、语词音韵以及有关西夏医学、音乐、道教、历法、军事、法律、经济、历史、官私印章、族姓、文册等资料，还

有西夏僧人传记、文集等遗书，特别是还有夏、藏文注音对照残卷，极富研究价值。汉文古籍西夏文译本类《孝经序》《孙子兵法》《将苑》《经史杂抄》。西夏文字典、韵书类《文海》《同音》《杂字》等。西夏文学作品有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五言诗《新集碎金置掌文》。其他尚有：译自汉籍的《德事要文》，僧人传记《寄照国师传》《沙门善海奉诏集》，历书残页、医方和星占卜筮，西夏文法律文书，如刊本及写本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事法律文书《贞观将玉镜》，大量的籍册残页，以及西夏文佛经80多种，这些佛经分别译自汉文和藏文，有些已经无法找到汉文、藏文的原本，具有独立的目录学价值，有些则具有相互印证的校勘作用，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比如《诸说禅源集都序干文》和汉文《禅源诸论集都序》、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等，正是禅学史研究相关材料业已穷尽以后的新的补充。所有佛经和相关文献的目录，对于完整勾勒西夏佛教的依持框架具有根本性的作用。

在英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只能暂时压抑住探秘西夏历史的浓厚兴趣，放弃对这些文献内容价值进行仔细的研究，因为目前最为紧要的工作是将它们分类整理，尽快出版。装帧、版本问题是有幸接触原件的学者最先需要甄别、考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英期间主要的研究工作是记录文献的原始数据，鉴别文献的版本状况等等。我们事先拟订了著录的义项，包括原始编号和现编号（原始编号对于分析文献的组群伴生关系十分重要，可以编制出各个出土地点的文献索引）、原装形式（包括单页、卷轴装、经摺装、梵夹装、蝴蝶装、粘叶装、残片）、尺寸（纸高、宽，纸幅，卷心或版心）、纸质（当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纸，但实际调查结果只是各种不同样式的麻纸，厚薄色泽净污等）、纸色、墨色（深浅中等）、写刻形式（写本、刻本、活字本、绘画等）、批注印章等等。总共40个左右的预选项。我们注意到，斯坦因获取文献以后，首先对于大多数文献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编号。此后，大英博物馆在夹存到玻璃板中去的时候，又做了新的编号。经过仔细的考察，我们发现这次编号不是单纯地按照从麻袋中取出顺序的随机编号，不是简单的财产登录，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初步整理。我们仔细辨认了相互接近的材质和形式甚至内容，某一玻璃板中常常夹存同一类型的残片，写本、刻印本、活字本被分别归属，而它们却常常是从不同的发掘地获得的。我们十分惊讶他们对于活字本的鉴别能力，现在越来越

受到关注的活字本，早在夹存入玻璃板以前，已经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合理的归类。

三 文献版本的新发现

1 蝴蝶装与其它

每块玻璃板并不是很重，大约三斤左右，但一天翻看几百份却也能使心力耗竭。图书馆的环境干燥、静谧，比起国内许多私人收藏往往难以克服天气影响而使文献发霉变质来，这样的文献收藏佳地似乎对西夏来说也殊为可幸。但这样的环境却并不适合于长时间进入，虽然阅览室十分空旷，但近乎封闭的空间总让人感到郁闷缺氧，再加上心情的迫切和饮食的简单，一天紧锣密鼓的工作即能把人的精力全部耗竭。所幸伦敦五月晴朗的天气还是颇多迷人之处，下午五点图书馆闭馆，从图书馆回寓所一路遍地撒金，阳春的晚风抚面，着实让人沉醉。一直以来，我在心中都宁愿把“丝绸之路”想象为金色的，大漠荒沙，商队金色的驼铃，以及那数不清散落于路上的珠光宝器都促成了这样一种带有孩气的想象。而如今，伦敦的夕阳的确营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仿佛“丝绸之路”在自己的脚下延伸，我们的每一步都在踏着玄奘、鸠摩罗什等致力于人类精神世界建树的大师们的脚印前进。我似乎听到了他们的呼吸，感受到了他们对于人世苦难的困惑，对永恒幸福的执着，超越有限生命的挣扎，穿越时空的心灵相通感超越了现世的疲惫，并且，疲惫的感觉反倒使我油然而生出巨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许这就是人生幸福的真谛，用有限的生命承接无限的人类命运的探索之路，在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实现生命永恒的奔腾。

接下来的数天里，工作进展速度并不是很快。玻璃板增加了辨认文献版本的难度。每著录一件，需要十分分钟左右。当然我们最先着手的是辨析这些文献最直观的体式，其中之一便是装帧。装帧看似只是简单，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不同的装帧体式体现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的阅读要求和阅读习惯。装帧形式的剧烈变化期，是在唐宋之间。从现存敦煌写本来说，已经具备了卷轴装、龙鳞装、梵夹装、经摺装、粘页装、蝴蝶装、线装的各种形式。但是，由于写本占据的绝对地位，从简帛形式导致的卷轴装，从贝叶形式导致的梵夹装，从卷轴装演变的经摺装，从卷轴装演变的龙鳞装，始终是主要的形式。由于印刷术的发明，雕版所用木板规格的限制，经摺装、蝴蝶装、粘页装和方册线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所有这些装帧形式，法国的戴仁先生和中国

的方广钊先生都有完整细致的叙说。而各种装帧形式(除龙鳞装以外)在英国的藏品中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现,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至今没有命名的装帧形式。

在英藏西夏文献的装帧体式中,蝴蝶装最为常见。据考,蝴蝶装是宋朝才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装订方法,是册页装订的最早形式。将书页有字的一面沿中缝向内对折,将全书书页排好为一叠,再将中缝背面戳齐,以胶料粘连,用厚纸包裹做封面。蝴蝶装比卷装翻阅方便,流行于宋元时期,是书籍装帧史上的一大进步。我们所录的第3197号文献,高197mm,宽227mm,刻本,就已改装成册页,分为5开。依次为佛画,供养画,佛经,草书西夏文。第3372号(K.K. .0239.qq),高170mm,宽225mm,写本,纸质薄,作折角排列,亦为蝴蝶装,左上正反面文字互相倒置,可见其头对头折叠方法。

还有一种特殊的装订形式,尚未见诸著录。在已知的装帧形式中,大多是横向(径向)翻阅的,这符合汉字竖写、由右向左逐列书写和阅读的习惯。由于藏文是横向书写,逐行向下阅读,就继承了梵夹(贝叶)装横宽高窄的形式,梵夹装的经典不是横向(径向)翻身的,而是垂直的轴向翻身的。我们至今可以在寺庙中看到,僧人、道士在念颂的时候,一手奏乐,一手翻页,正反两面互相颠倒的文字,正好非常方便单手翻动。但是,我们在英藏西夏文文献中发现的样式,是粘页装的尺幅和样式,却采用梵夹装的翻身形式。简单地说,就是正反两面合起来粘贴成一页,但是文字是互相颠倒的。这样就必须是上下翻身,而不是左右翻身;然而高度大于宽度的纸页肯定只适合左右翻身,不适合像梵夹装一样地上下翻身。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读的书一样,看完一页之后是把书颠倒过来看下面一页。我们无法用现成的术语来指称这种特殊的装帧形式,就姑且称为“特殊形式”吧。这种特殊形式在英藏西夏文文献中屡屡出现。其典型的有Or12380-0227、0249、2213等,正、背面是粘合在一起的。

英国藏品中还拥有我们目前所知的许多装帧形式,其卷轴装大体变化为单叶的文书,或者部分经折装样式(卷轴装和经折装的亲缘关系是最接近的)。有十分成熟的线装本,如Or.12380-0044号左侧有穿线针孔,中有书口,写有书名,已非蝴蝶装的素口,表示已经从当时多见的蝴蝶装向线装方册转变。大量所谓“蝴蝶装”的文本,严格意义上应是“粘叶装”,^[2]特别是大量前后“头对头”纵向折

页的样式,和现代印刷的折页相仿,应当引起注意。

一般认为,线装样式出现较晚。现存的大量所谓“方册装”“穿线装”,都不是特定定义的“线装”。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却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线装书”。具备了“线装书”的一些技术要素。如0044(K.K.II.0283.aaa),高175mm宽400mm。2纸。线装,白麻纸,纸质中等厚薄,墨色中。印本。背面无字。本号共3件,为同一厚纸中揭裱出的正、反文字面和中间空白夹层。左侧有装订穿线针眼。为线装书完整一叶的上半部分。3110+3111+3113+3116+3117+3205(K.K.II.0297.q),高150mm,宽155mm。残片缀合改装为线装册页,305x222。似为字书或类书。大字刻本,粗麻纸印制。还原天头30mm,地脚20mm,版心高222mm,宽150mm,每页7行,行8大字,行距20mm。多页圆点中填有红色。纸色灰暗,多污痕。第一页有阴文刻标题或字头。存上半。

2 高僧血书与田园版画

在众多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样式当属血书和版画。血书一般为高僧以自身鲜血和墨写成。以血掺入写经,非对佛祖至为虔信不能办到。在古代还没有防止血凝或血液变质的技术,所以要以血写经,首先必须选择寒冷的冬天,这样新鲜的血液不会招致细菌虫蚁,腐化变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写经之人必须不时地用银针刺伤身体以提供液体的血,否则一次性的提供的血很快就会分层凝固,根本无法和墨,色泽也黯淡许多。血书甚为金贵,一部血书即可为一寺院镇寺之宝。我们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亲眼看到了这些令人震惊的经书。第3502(K.K.V.b.019.j-D)号西夏文献,高205mm,宽130mm,多纸,写本,血书。第3551(K.K.V.b.015.p)号西夏文献,高140mm,宽145mm,2纸,经摺装,写本,墨色浅,血书,用纸细白。不知这些血书出自何人之手,也不知书写血书的人是为了己身的超度还是为了警示世人,由这一行行渗透着一个人鲜血的经文,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世间一种强大的祈盼。这种祈盼使人的心沉重而压抑,因为它让我们觉察到了世间永存的那些不可弥补的缺憾。

相比之下,版画给人的感受更轻松愉悦。版画的由来说来话长。较早的敦煌文献的一大特色是佛经写本佛经插图。敦煌藏经洞的纸本绘画具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写卷的展示作用。最典型的是P.chin.3995《炽盛光佛》,具有后期水陆画的悬挂顶礼的作用;P.chin.2010《观世音经》,上图下文,随文图解观世菩萨以32化身救渡众生的故事,是中国最早的连环

画形式之一。《降魔变（劳度差斗圣变）》则是讲唱文学的最早典范。正面绘画介绍“降魔”的十几个回合的故事，面对观众演示，背面则书写变文台词，由演示者进行宣读讲唱。卷轴转过，解说相随。可见敦煌文献的插图已经呈现相当丰富的样式。

当佛经编纂和流通进入刻本时代，也就是宋——西夏时代以后，刻本中的绘画就体现为雕版印刷的最早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夏版画除了在工艺上的创新以外，在形式和独立的表现语言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从唐咸通九年（1868年）《金刚经》版画到宋元之间的版画，虽然不乏佳作，比如宋代的《梅花喜神谱》《天竺灵签》、雷峰塔出土吴越王捐施《陀罗尼经》、四川出土的《陀罗尼》等，但其中总是由于材料稀少而难以贯穿起各自的环节，而唐代版画的一些优秀传统则在西夏版画中得到了全面的继承。

西夏文献中的佛教版画，不仅数量较多，可以说是早期版画的最集中的体现，而且水平很高，具有多样的高级形态的样式，可以说是继轨大唐、开启宋元。其特点主要是增强了叙事性，壁画题材反映的佛经故事比如观世音救难故事、普贤行愿品的10个情节描述、西夏译经图的场面叙述等，都直接采用了各种生活场面。其次是具有很强的人物写实能力。描画对象从佛、菩萨扩展到供养人和被接引者，就有了更多的不受佛像制作的限制，在谋篇布局和刀法运用上更加成熟，有时非常恰当地运用了阴刻和阳刻的对比。

其中我尤喜第3723（K.K.II.0274.ddd）号版画。起高88mm，宽113mm，2纸，蝴蝶装，刻本。西夏版画多佛教题材，身披琉璃宝络的菩萨大士神态各异、精美绝伦。而此幅版画却以描写鸟、柳树、假山石、栏杆等花园景致为题材，笔法疏朗细腻，与江南园林颇有几分神似。在塞漠西域，春风不度玉门关，小园香径本就十分罕见，人们的心灵更多在无涯的苍穹中翱翔，把浓彩华美的西天胜境当作永生乐土，很少有人像中原人士那样有着“性本爱丘山”的蛊惑，去留连家中的庭院。不知这张版画的制作是出于何人之手。是流落到西域的贬官？还是怀才不遇的文士？来描画了这花落燕归的无奈和感伤！

3、令人赞叹的泥活字本

在雕版刻本和写本之外，我们看到了许多活字版本。活字版本是应文化繁荣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是当时西夏王朝教育普及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对

西夏文献的年代考证来看，西夏人与中原几乎同时开始使用活字印刷出版，并且别具匠意。至于西夏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活字印刷术，印刷出版过什么文献，在汉文献中没有记载，目前只能从已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刷品中进行研究。区别雕版印本和活字印本书籍是一件细致而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在早期活字印本很少，缺乏前人经验借鉴的情况下，识别活字印本更为艰难，但也并非无迹可寻。活字印本以很多单个活字拼为一版，这些字并非一人、一时所写，所以就造成同一页面字体肥瘦不同，笔画粗细不一，特别是由于活字聚版不精或活字不规范而造成部分字型歪斜。因版面不平，形成文字以字为单位浓淡有别，经背透墨也往往以字为单位深浅不一等，这些都是区别活字本和木刻本的重要依据。非常典型的是Or.12380-3016，粘叶装，文字大小不一，排列扭曲参差，具有这是一般活字本的特点。

目前的研究表明，西夏文佛经实际上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当然也是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而对于英藏文献中活字印本特别是泥活字印本的描述，却将是本次著录的一项重要发现。因为泥土不能湮水，而且强度太低，实质上都是经过烧制，“火烧令坚”，应当是“陶活字本”。由于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一般也就可以称呼为“泥活字本”。英藏文献中的泥活字本，其基本特征是，除了木活字的一般情况（字体肥瘦正欹、字列歪扭不齐、字间互不参插、版面四角开口、绝无断版等等）外，几乎每个字都磨损了方角，而仅剩圆形的字核。这是因为多次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字角磕碰，还有是因为刷墨、刷印时鬃刷的压力和摩擦，也会使得边角首先磨损。相对来说，木活字坚韧而有弹性，不怕磕碰，耐受力，就不太会有单个字体边角塌陷的情况。

按照《梦溪笔谈》的叙述，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泥活字的说法，“用胶泥刻字”，尚未有说用模印方法大量生产单个字体的说法，而且肯定说明了重复使用的情况：“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用迄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此或为沈括初知或者初见泥活字制作使用的情况。

虽然《梦溪笔谈》叙述十分明确，泥活字在印刷完成以后是立刻回收重排循环使用的，但是后来的发展是否就是如此呢？是否已经采用了模印制作的方法大量烧制而不需要循环使用了呢？至少到清道光咸丰

年间，安徽泾县人翟金生印制《翟氏宗谱》（1857年）等书籍时，已经使用了“泥活字模”，“仿效北宋毕升造泥活字的方法，分五种规格造出十万字泥活字。”^[3]可见单个雕刻已经不能满足动辄“十万字”之需的加工速度。木活字的特点是刚性的、无法模印，再生产很不容易，重新回收利用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泥活字则可以通过模印、烧制的方法制作，其重复生产相对容易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雕版印刷品是整体版面的边角磨损而不是单个字体的磨损，而活字印本则通常是单个字体的边角磨损，而泥活字本的使用假设和木活字本的使用假设也是不一样的。各自的使用假设是由不同的幅面、印数、页数和许可条件来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单个字体的磨损情况来推断泥活字印本，但并不是说没有磨损的就一定不是泥活字印本，只是特征不很明显，需要更多的证据。如果泥活字有可能是模印制作的话，那么模印过程中边角的不丰满具足，也应当是先天的工艺缺陷。即使不是模印，在烧制到1000度以上而逐步冷却的情况下，泥活字的细小边角也是首先容易氧化断裂磕碰缺失的。例证：Or.12380-3016（K.K.II.0244.qqq）高1650mm，宽1130mm，1纸，残片，写本，纸质薄，存7行，行13字，可能是蝴蝶或者经折装。行列排列不整齐，大多数字模已经倒成圆角，不仅是因为多次拆版使用，而且是因为泥制活字，才可能形成此种状况。边缘文字有塌陷，可知拼合以后已经长期使用，背面痕迹深浅不一，不足为证，因纸张之厚薄不匀，远超过活字压力之大小，字体笔画交叉处并无刀痕，颇似模印。

西夏在继承北宋泥活字印刷出版的同时，还成功创造木活字印刷出版。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毕升泥活字成功的过程，也如实地说明木活字印刷不成功的原委：“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细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4]但在英藏西夏文献中，我们的确看到了成功的木活字印刷。137（r924）为英法所藏篇幅最宽大的木活字印本，高250mm，宽550mm，2纸，6开，线装，刻本，活字本，纸质薄，版心高180mm，上下双线。纸幅最大一张宽370mm，36行，行16字，上下左右排列不齐，墨色参差，笔画交叉处冲过刀痕明显，和泥活字显然不同。181b号，高250mm，宽235mm，2纸，刻本，活字本。181h1号，高118mm，宽102mm，2开，已裱贴，4行，刻本，活字本，一、三列首字有木活字方底座痕迹，是非常典型的木活字本的标本。

四 再度探访黑水城遗址

我们在英国搜集了收藏和研究情况的资料，以及发掘获取情况的文字记载。但如果还要进一步追溯，比如斯坦因发掘了哪些地方？斯坦因的发掘和科兹洛夫的发掘、也就是俄藏文献和英藏文献有些什么关系？黑水城的现状、包括许多文献的出土地点的现状是怎么样的？黑水城的地理状态和生态环境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对于确定析清英藏黑水城文献的来龙去脉，科学地界定每一件文献在整个文献中的位置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你要确认所谓“光辉大塔”的性质和封闭原因、时间，你第一需要的是要知道从这里出土了哪些文献，斯坦因在几乎每个残片背后或者夹层里都写了出土遗址的代号和编号，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们记录下来，并做成和现有馆藏号的对照表，因此，要说这里出土了什么，根本没有依据。而我们第一次做了这事，这样一件看来似乎很技术化的小事，却是所有定质定量分析的基础。同样，因为其重要，即使记错一个，也将对后期研究造成误导，以致得出错误的结论，不知要过多少年才会有机会改正。

在吴芳思帮助下，我们查阅了英国图书馆馆藏的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的资料，整章复印了关于黑水城发掘的章节，在使馆李雪松同志帮助下，通过网络检索和查看卡片等，最终提交吴芳思帮助复印了100多页A3资料，其中包括斯坦因《亚洲腹地》中黑水城的外景照片和实物照片，测绘地图和文物发掘地点的示意图，部分英藏黑水城文献、文物的叙录。购买了1972年出版的对西夏文字研究，格林斯坦德《对于西夏写本的分析 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其中有吕惠卿《重译孝经传序》的汉文译本。1953年出版的马斯伯乐《斯坦因搜集中亚汉文文献 LES DOCUMENTS CHINOIS》，主要是对于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对于比对定义西夏文文献、整体把握黑水城汉夏文献体系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英国回来，我们便奔赴茫茫戈壁中的黑水城，曾经的“西夏文明博物馆”，去考订文献的具体源流。从银川坐车去额济纳，沿途多胡杨沙丘，头上一抹蓝天，炎日当顶，其粗犷荒凉之感与微雨中的伦敦恰成鲜明对比，抵达黑水城时已近黄昏。黑水城曾经是名震西域的城市，它比邻蓝宝石般的居延海，草长莺飞，牛羊成群，它的繁华曾让见多识广的马可波罗惊叹。如今黑水城旧址上只剩下被黄沙半掩的残墙断壁，“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种景象尤其让人感觉到时间变迁的不可思议。在《桃花扇》里就有“眼看

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唱词，而在塞漠西域，历史的浮沉更为惊心动魄，其中的凄凉超出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任何人站在这块连鸟兽都罕见的戈壁上，恐怕都无法想象这里也曾是衣锦繁华的皇城、温柔富贵的府邸。

靠着从英国图书馆带回的斯坦因黑水城考古的相关资料，我们按照斯坦因发掘的顺序，重新确定了各个文献出土的方位信息。

“K.K.I 为一古庙遗址。废墟堆中，破碎的木片、陶器随处可见，散置在看起来好象是主要通道的路面。其中一些木片上写有杂散的汉字，此外是写有字的纸张，看来都是被当作“废纸”遗弃的。这些文件大多破损不堪，有的极为细碎；其它一些看上去比较完整的则被扭成卷或揉成团。还有一些写有汉字的条状纸被束成结。这其中写有汉字的文书最多，到现在为止所作的粗率清查中，除了一些印制的文书外，多为写本。约计汉文古文书、残片 230 件，西夏文古文书 57 件，其中印本约占一半。残片中有西藏文残本 3 片，汉文有西藏文注释的 1 片，西夏文藏文合一的 2 片，回鹘文及突厥文 9 片。”编为 K.K.I. 遗址出土的文献主要有《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和其他一些佛教经颂的残片，其编号集中为 K.K.I. 的 04 号。

“城内另一座可能藏有珍贵文物的寺庙遗址 K.K.I. ii，位于从城东门通向城中的一条街的尽头。寺长 82 英尺，宽 63 英尺，建在一座泥筑高台上，台基呈三叶形。大殿宽 12 英尺，长 17 英尺，面朝石阶。从阶石直上，中央为一大厅，两旁辟有大室。地台上原有佛像，现只存一些碎片。在殿南角发现 15 页梵夹装写本及印本的西夏文书，还有不少小残片；此外还有小张的汉文写本、印本及西藏文书，还有印制的佛像一张……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另一个角落发现的写本及印本也是出于同一目的而一起供奉在那儿的。”K.K.I.ii. 遗址出土的文献，按照斯坦因当时编号还原，主要有：《佛说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罗密多经》《圣贤慧到彼岸功德宝集颂》《顶尊相胜总持功德经韵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其他则有一些经颂和暂时不能确认的佛教文献。

我们也看到了斯坦因记载中城西北角上的四座窠堵波，它们几乎完整无缺，在整座黑水城遗址中显得分外突出。“最北端的一座最大，已被切开，连墩座仍有 20 英尺高。发掘出的东西仅限一些相轮小塔及佛像砖。其它三窠堵波 K.K.V.b 位于大窠堵波之南，下面泥沙堆积。将积沙移开后，发现有保存完好的西

夏文书，多数为写本，也有印本；又有大梵夹装西藏文书，都扎成小束，杂乱嵌在窠堵波的碎沙墮砖之中。此中完整的西夏文书约有一百余叶，西藏文的五十左右，残片不计其数。此外还有图画类，其中有一蓝绢 K.K.v.b.01，形制仿佛残幡，上有莲花图案，此物与其他西夏文书等应为供养之物，施舍入寺。”

最后我们来到了所谓“光辉大塔”的旁边。斯坦因说“激起我浓厚兴趣的就是 K.K.II 遗址，在我到达此处的时候我听说这里就是柯兹洛夫上校 1908 年挖掘出大量文献、书画及其它古物的地方。K.K.II 临近河床西岸，距黑水城西门约 440 码，残毁严重。第一眼看上去只能辨认出 28 英尺方，7 英尺高的砖砌平台。台侧砖瓦木石散乱满地，塑像外部施彩的石灰衣残块也掺杂其间。地面木架苇杆之类四处散置，应是以前塑像的像胎。这些杂物堆凌乱不堪，似乎不足一顾，然而将其清理之后，下面却藏有保存良好的纸籍。小心移除这些杂物花费了我们一天半的时间。”

“砖台东侧中部突出约 1 英尺，上面环绕着一座圆形短垣，直径约 13 英尺，高约 2.5 英尺，垣宽约 3.6 英尺。我的探险队中雇有八名蒙古人，其中一名叫沙皮尔 Shapir，柯兹洛夫在黑水城考古时，此人也曾参与。他告诉我此中至少有一座真人大小的造像，大像外环有无数小像。之后我们在积尘堆中发现大塑像头一枚，残破不堪，又获得其他一些近似真人大小的泥灰造像残片，足以证明沙皮尔所言非虚。他又说各造像间的空隙中，堆满书册绘画及小佛像等，如他所言，柯兹洛夫在此处收获颇丰，并且剩下的遗存物中，仍有大量是柯兹洛夫“探险”过程中被当作废品留下的。沙皮尔又说柯兹洛夫到此处时，此遗址并不见有入口，只在顶上开有一小孔。据柯兹洛夫报告《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Mon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Khara-khoto, Mongolia-Petrograd, 1923)^[5]所说，他曾在此遗址发现一具骷髅，因而此遗址毫无疑问该为一大陵墓……尽管柯兹洛夫将发掘所得席卷而归，遗留未取的却也有不少。此处所藏珍贵文物如此之多，因而伊凤阁等人的探讨对于整个遗址的研究，必也能带来些启发。”

“此处大墓遗物中比较可称道的，第一为大量西夏文写本及印本，除小残片不计外，搜集所得稍加估计，约有 1100 叶以上西夏文写本，印本约 300 叶，其中多有残缺。汉文写本 59 叶，印本 19 叶。西夏文书多为佛经，与城中遗址所得汉文多而西夏文少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两处的年代大致相近。估计当时虽

为西夏国，西夏文字盛行，然而世俗文仍以汉文为主。在 K.K.II.遗址处仅获得完好的西藏文书 13 叶，相对的在 K.K.V 处所得则为数甚多，这也十分有趣。目录上所载 K.K.II.0234.K 之西藏文与西夏文合璧文书，曾由劳弗将其中所与西夏文相对应的西藏字一一注出。今后若能在彼得格勒所藏西夏文书中寻得此类西藏文西夏文合璧文书全本，对于西夏文研究必能有所推动。此外回鹘文书仅写本一片，汉文婆罗迷书合璧文书两叶。”

“此外还有可注意的，此处所发现的西夏文及汉文文书，无论写本印本，几乎全是长方形书册式，书册是由千佛洞所藏卷子的式样演变而来，宋以后中国所有雕版书皆用此种形式。至于此地发现的唐代风格的西夏文及汉文卷子，统计不过二十余卷，还有一些绢质西夏文书，应该都是偶尔仿古制作的。其中还有很多书有文字然而裂成小片的碎纸，并不都是发掘时的锹锄等所伤。这种残碎不堪的纸竟能夹杂在废弃物之中未遭销毁，大概是中国古来敬惜字纸的风气所致。”

关于 K.K.II.遗址的年代和性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 其建立的年代。关于佛塔建立的年代，向来没有明确的意见。至今没有确认从佛塔出土文献的下限记载。柯兹洛夫没有出土地点的记录，斯坦因文献虽然已经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整理刊布了 1—4 册，尚有第 5 册没有完成，即使斯坦因有严格的出土地点记录，但有时也是听任当地采集者口述，未必认真核实过。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成果，也没有完全公布。所以，从材料内证来判断佛塔的年代，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从而对其属性判断也是同样条件不够充分。

(2) 对其藏品（包括俄罗斯柯兹洛夫搜集品）的类别和统计数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其中佛教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但是世俗文献则主要是国家、官方的政令文献。佛塔的形制，有人认为，西夏佛塔是方形或者六角形、八角形或多角形的，而元代佛塔就是喇嘛教的圆形白塔。从柯兹洛夫的考察队照片中可以看到，此座佛塔正是多边形的，但并不足以说明这就是西夏时期所建的佛塔。

(3) 佛塔建立的位置，距离元代城墙有 400 码，距离西夏故城更远。如果不是特别的理由，西夏故城西北面原先就有斯坦因所记“K.K.I.i”和“K.K.I.ii”佛寺，似无必要在城外更远的地方建塔，何况较为近近的西北角城墙下连续的四五座佛塔都是元代的。

[参考文献]

- [1] 伯希和. 敦煌藏经洞访书记 [M] // 伯希和著, 耿升译. 伯希和西域探险记.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269—271.
- [2] 方广錩. 谈粘叶装 [J]. 国家图书馆学刊增刊·西夏研究专号, 2002: 29.
- [3] 国家文物局,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图录 [M]. 北京: 朝华出版社, 1997.
- [4] (宋) 沈括. 梦溪笔谈 [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3.
- [5] (俄) 科兹洛夫. 死城之旅 [M]. 陈贵星译.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

[作者简介] 束锡红 (1964—), 女, 江苏无锡人, 博士, 教授, 北方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方向: 民族文献学。

[收稿日期] 2011—12—21 [责任编辑] 张京生

动态·资料

甘肃省流动儿童阅读中心挂牌

最近, 甘肃省流动儿童阅读中心在甘肃省图书馆正式挂牌。该中心由甘肃省妇联和甘肃省图书馆共同倡导成立, 旨在依托省少儿图书馆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共享公共文化资源, 满足流动儿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培养流动儿童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阅读习惯。

当日, 由甘肃省图书馆创立的农民工之家也正式挂牌。农民工之家以开展对农民工的文化服务为宗旨, 及时捕捉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信息, 除提供图书阅览、上网浏览等常规服务外, 还将为农民工免费提供劳动保障、用工信息、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还将为农民工开展业余文化活动提供场所。

——摘自 2012 年 8 月 17 日《中国文化报》